阿嬤的家

113 下 歷史與世界：11 世紀以降

經濟系 張仲忻 113072171

目錄

1. 前言

2. 阿嬤的來處

3. 台北的風

4. 那些沒說出口的事

5. 自己

前言

這篇，寫的是我的阿嬤。

寫她的來處，寫她的去處，寫她在這七十年間，如何在一個又一個不屬於她的地方，蓋出一個又一個屬於她的家。

開始動筆的念頭，其實來得很突然。

我一直覺得自己很了解阿嬤。我知道她喜歡吃什麼，知道她幾點起床。可是當老師在課堂上說「每個人都是行走的檔案館」時，我忽然發現，我對阿嬤的人生，其實什麼都不懂。

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只讀到小學三年級。不知道她為什麼二十二歲就去六福客棧打工。不知道她為什麼滿口假牙。不知道她為什麼後來會去學日語、去日本參拜、在一個寺院裡做到主任。這些「不知道」，像一顆又一顆的石頭，堵在我和她的中間。我想把它們搬開。這是我的第一個動機——我想認識我的阿嬤，不是作為「阿嬤」，而是作為一個人。

可是這份作業不只是關於我，也不只是關於阿嬤。

課堂上歷史講的都是大敘事，可是這些事，到底跟普通人有什麼關係？課本上寫著「民國七十三年麥當勞進入台灣市場」，那不過是一行字、一個年份。[1]可是對我的阿嬤來說，那是一場海嘯。麥當勞來了，肯德基來了，她的熱炒餐廳就這樣被沖垮了。她的倒下，不是因為她不會做生意，而是因為一個她完全無法對抗的時代轉折。

課本上寫著「戰後台灣的嬰兒潮世代」，聽起來像一個統計數字。可是我的阿嬤就是那個世代的人。[2]她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年代出生，在資源匱乏的農村長大，然後湧入都市，成為台灣經濟奇蹟背後那雙看不見的手——那雙炸排骨、端盤子、熬夜結帳、變形到像老樹枝幹的手。

所以我想寫下阿嬤的故事，寫那些被政權更替、經濟轉型、社會變遷碾壓過去之後，還站著的人。她們的故事，就是真正的歷史。歷史從來不只是總統和戰爭，歷史是每一個普通人活過的痕跡。阿嬤的出生、遷徙、創業、失敗、再起、轉型、退休、修行——她的每一個人生節點，都對應著台灣社會的某一

[1] 麥當勞重要里程，https://www.mcdonalds.com/tw/zh-tw/about-us/milestone.html，（檢索日期：2026 年 5 月 18 日）。

[2] 戰後嬰兒潮的世代，https://tcmb.culture.tw/zh-tw/detail?indexCode=Culture_Event&id=311229，（檢索日期：2026 年 5 月 18 日）。

次轉折。清領與日治時期劉家輝煌的殘餘、戰後苗栗農村的人口外流、民國六十年代台北的都市擴張、速食文化對傳統餐飲的衝擊、民國七十年後的房地產熱潮、乃至老年女性在宗教中尋找自我歸屬的現象。[3]阿嬤一個人，就走過了這一切。

一個人的一生，就是一部濃縮的時代史。

這就是我選擇阿嬤作為家族史主軸的原因——不是因為她最成功，不是因為她最會賺錢，而是因為她的人生軌跡，恰好嵌進了台灣這塊土地的每一個關鍵轉折。讀懂了她的故事，就讀懂了一個時代的台灣女性如何在縫隙裡活下去，如何在沒有資源、沒有人看好的情況下，用自己的雙手，替自己和下一代，蓋出一個家。

這份作業的訪問對象，是阿嬤本人，我也訪問了爸爸和兩位姑媽，補足一些阿嬤自己不願意說、或者覺得「沒什麼好說」的部分。訪談的過程比我想像的困難，不是因為阿嬤不想講，而是因為她覺得那些事情太普通了，不值得寫。她說：「以前的日子就是那樣啊，有什麼好寫的？」她不知道，正是那種「就是那樣」的尋常，才是最值得被記下來的。[4][5]

寫作的方式，我選擇了敘事為主，把阿嬤的人生重新走一遍，我希望的是有溫度、有氣味、有聲音的敘述。讓讀這份報告的人，能聞到炸排骨的油煙味，能聽見八德路那間破屋子裡的嬰兒哭聲，能看見一個女人在收攤後把睡著的孩子從椅子上輕輕揹回家的身影。

最後，寫給阿嬤。

謝謝妳沒有放棄。謝謝妳在每一個想要放棄的時刻，都選擇了繼續往前走。謝謝妳從西湖走到了台北，從田埂走到了佛堂，從一個不被期待的女兒，變成了一個撐起一個家的母親、一個老闆、一個主任、一個會在清晨五點走進佛堂的女人。

這是妳的故事。

現在，它也是我的了。

---

[3] 臺北歷史概述，https://www.gov.taipei/cp.aspx?n=14D2637CBC4AAEC2&s=E0ACC486E3DA0A8C，（檢索日期：2026 年 5 月 18 日）。

[4] 口述訪談，作者於丰鐸咖啡所訪問阿嬤，2026 年 5 月 9 日

[5] 口述訪談，作者於奧蘿茉咖啡館訪問爸爸和姑媽們，2026 年 5 月 10 日

阿嬤的來處

她是在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那一天，落在苗栗的。西湖鄉的山色正從濃綠往枯黃裡轉，稻子剛收割完，田裡剩下齊齊的稻茬，像大地上剛剛理過的短髮。她哭著來到這個世上的時候，沒有人知道這是一個註定要走很遠路的女子。客家人的庄頭裡，多一個女嬰，就像埤塘裡多一滴水，不驚動什麼，也驚動不了什麼。

她的家族，說起來是西湖劉恩寬的後代。那是一個曾經在清領、日治時期燦爛過的名字。劉家的宅院曾經闊氣過，田產曾經廣袤過，族中子弟曾經穿著長衫在廳堂裡誦讀詩書，曾經在地方上說得上話。那些年歲，家族的榮光像午後的日頭，鋪天蓋地地照在西湖的山谷裡。[6]可是政權更替像一場又一場的颱風，吹過去，留下滿地的斷枝與落葉。等到阿嬤出生的時候，那些曾經的輝煌，已經什麼也不剩。留下來的，只有一塊不算大的田，一間舊屋，和一個根深蒂固的念頭——男的，才是香火。女的，不過是灶邊的柴，燒了也就燒了。

阿嬤在家裡六個兄弟姐妹中，女孩子裡排行老二。兩個哥哥在前頭，像是兩面旗幟，舉著劉家的門楣，而她和姊姊、妹妹，只是旗子後頭的影子。很小很小她就明白了這件事，不是誰告訴她的，是日子裡長出來的明白。哥哥們可以讀書，可以上桌吃飯可以先動筷子，可以在大人說話的時候坐在廳堂裡。而她和姊姊，要去灶下，要去田裡，要學會閉嘴，要學會把自己的願望縮得很小很小，這樣才不會礙著誰的眼。

她只上過小學三年。

在那一千多個日子裡，她曾經是個會對著課本發亮的女孩，在算術本上一筆一畫地寫字，在老師唸課文的時候，偷偷在心裡跟著唸，覺得那些方塊字好美，像田埂上開的小花，一朵一朵的，排成句子就成了風景。可是三年到了，書包就要放下來了。沒有爭辯，沒有商量。外曾祖母說回來，她就回來了。

「阿嬤，妳那時候想繼續讀嗎？」我問她。

她沉默了一下，說：「想啊，怎麼不想。可是沒辦法啦，那個時代的女孩子就是這樣。我媽媽說『妳回來，家裡要幫忙』，我就回來了。沒有什麼好講的，也不敢講。」

---

[6] 西湖劉恩寬家族，https://tcmb.culture.tw/zh-tw/detail?indexCode=Culture_Organization&id=618467，（檢索日期：2026 年 5 月 18 日）。

回來做什麼呢？什麼都做。天還沒亮就起來，灶上的火要先生，一家子的飯要先煮。田裡的事也要做，插秧、除草、撿地瓜，曬穀子的時候要在旁邊趕麻雀，太陽毒的時候，頭上只頂著一方破斗笠，腳踩在燙的泥裡，手掌心的繭一層疊過一層，像是她生來就帶著的。她學會了所有農人該會的事，也學會了那個時代認為女人該會的事——煮飯、洗衣、餵豬、醃漬物、織毛線、補衣裳。她做得又快又好，被要求不能停，不能慢，不能讓人嫌。

可是那時她還是個孩子，一個應該還在田埂上追蜻蜓、在廟口看野台戲、跟同年紀的女孩跳橡皮筋的孩子。她沒有這些。她的童年像一件洗太多次的衣衫，顏色早就褪光了，只剩下灰撲撲的底子。

「有一次我在田裡除草，站起來休息一下，看到對面那座山，還有天上的雲，」阿嬤說，「心裡忽然覺得空空的，想說，我的人生就是這樣了嗎？我才幾歲而已。可是那個念頭一下子就過去了，因為田裡還有活要做，我媽又在喊我了。」

那個念頭，像一隻蜻蜓點了一下水，漣漪還沒散開，人就已經被拉回了現實。

阿嬤的十三歲，是一隻小小的包袱，是一程從西湖到市區的路，是她第一次離開家，到別人的屋子裡，去帶別人家的小孩。「保姆」兩個字說起來輕，做起來重。她才十三歲，自己都還是個需要被照顧的孩子，卻要照顧別人家更小的孩子。她要把奶瓶溫好，要把尿布洗好，要抱著哭鬧的嬰兒在深夜的房間裡來回走，走到手痠了也不敢放下來，因為那是人家的孩子，人家付了錢，她必須做好。她要學會看人家的臉色，學會在吃飯的時候先餵飽懷裡的嬰兒，等嬰兒睡了，桌上的菜可能已經涼了，剩菜剩飯拌一拌，扒兩口，就算一餐。

「晚上小孩子睡了，我自己躺在房間裡，會想家。」阿嬤說這句話的時候，語氣很輕，像是怕被誰聽見一樣。「會想到西湖，想到那條回家的路，想到我媽在門口喊我吃飯的聲音。有時候會偷哭，哭一哭就睡著了。天亮起來，還是要生火、溫奶，繼續做。」

她沒有說的是，那時候她也只是一個需要被照顧的孩子。可是那個年代沒有人會這樣想，包括她自己。

她就是這樣長大的。

沒有被誰捧在手心過，沒有被誰說過「妳將來一定會了不起」。她只是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家族裡，像一株被隨手丟在石縫裡的草，沒有人澆水，沒有人施肥，甚至沒有人期待她會活下來。可是她活了。她不但活了，還長出了自己的根，扎得很深，深到連後來的風雨都拔不起來。後來她會成為一個商人，會用

她在小學三年級學到的那一點點算術和認字，在市場的風浪裡站得筆直。後來她會養大一群孩子，會在那個男人可以輕慢女人的年代裡，為自己掙出一口氣，為身後的孩子掙出一片天。可是現在，她還只是劉家那個排行老二的女兒，穿著補丁的衣裳，腳上沾著田裡的泥，十三歲，正要走上那條通往市區的路。

「我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啦，」阿嬤說，「就想說，去吧，做了就有錢，有錢就可以幫忙家裡。哪有時間想什麼夢想不夢想的。」

那條路上沒有花，也沒有掌聲。只有風，很大很大的風。

可是她走過去了。她就是這樣走過去的。

台北的風

她十八歲那年，離開了苗栗。當我問起阿嬤離開苗栗的動機時，阿嬤只說：「也沒有為什麼啦，就是不想再待在那個地方了。田裡的工作做不完，家裡又重男輕女，覺得自己在那邊沒有什麼未來。就想說，去台北看看，看能不能闖出什麼名堂。」

她帶著一隻小小的包袱，裝了幾件換洗衣裳，就這樣上去了。

台北很大。那時候的台北還沒有那麼多高樓，中華路上還有平交道，火車從西門町穿過去的時候，噹噹噹的聲響能傳很遠。她第一次站在這座城市裡，感覺自己像一粒沙，被風吹到了陌生的河床。可是她不害怕。在西湖的那些年，她已經學會了最硬的功課——把自己縮得很小，把心撐得很大。

然後她遇見了他。

他是跟著蔣中正一起來台灣的士官長，是一個在軍營裡長大的少年。從大陸過來的時候，他帶的不是家產，不是田契，而是一條命。那條命在戰場上僥倖留下了，便在台灣這塊島上落了腳，在總統府裡謀了一份差事，穿上制服，站得筆挺，看起來像一棵紮了根的行道樹。其實他知道，自己也是漂來的，只是漂得久了，就以為腳下是土地了。

他們是怎麼認識的，阿嬤後來沒有細說。只說：「太久了啊，記不太清楚了啦。」或許是在某個街角，或許是經人介紹，或許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。總之，兩個從不同地方漂流到台北的人，就這樣遇見了。他們結婚的時候，沒有盛大的宴席，沒有白紗禮服，只有一張結婚證書，和兩雙同樣帶著傷痕的手。

阿嬤說：「婚後的日子，就是一天一天過啦，像一鍋慢火燉著的湯，不沸騰，卻也沒冷過。」

爺爺的薪水從總統府領回來，薄薄的一封，交到阿嬤手裡。她把錢攤在桌上，數了又數，米缸要錢，煤球要錢，水電要錢，每一塊錢都要去它該去的地方，很快地，錢不太夠了。兩個女兒接連來到這個世上，一個接一個，像兩隻嗷嗷待哺的小貓，哭聲此起彼落地填滿了那間在八德路租來的小屋。

那時屋子真的很小，小到轉身都會撞到東西，小到一家四口的呼吸擠在一起，夏天熱得像蒸籠。阿嬤每天去六福客棧做服務生，端盤子、送菜、彎腰賠

笑，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。[7]腳底板痠得像是踩在刀尖上，可是不能喊累，不能停。回到家，推開門，迎接她的不是安靜的歇息，而是兩個幼小的孩子和一片狼藉。

她永遠忘不了那個傍晚，推開門，一股刺鼻的臭味撲面而來。兩個姑媽，一個一歲多，一個還在襁褓中，身上、床上、地上，全都是大便。大姑媽臉上是乾掉的黃色痕跡，二姑媽的尿布已經濕透了，滲出來的東西沾得到處都是。她們哭累了，聲音已經啞了，只剩下一抽一抽的喘息。阿嬤站在門口，愣了那麼幾秒鐘。她的手還提著從六福客棧帶回來的剩菜，手指因為整天端盤子而腫脹著。她沒有哭，沒有罵，只是放下東西，彎下腰，開始清理。

更可怕的是後來那一次，二姑媽發燒了。燒到四十度。小小的身體像一團火。可是阿嬤不能請假，六福客棧的班不能不上，少一天的薪水，下個月的房租就交不出來。她只能餵了退燒藥，把孩子放在床上，匆匆趕去上班。那一天她在餐廳裡，一個盤子一個盤子地端，一個客人一個客人地招呼，笑臉迎人，溫聲細語，沒有人知道她的女兒在發燒，她的女兒一個人在那間小到不行的屋子裡，燒到四十度。

她說起這件事的時候，語氣很平靜。像在說別人的故事。可是她的眼睛裡，有什麼東西是暗的。是那種被命運掐住脖子之後，永遠留下來的淤青。

阿嬤不怪誰。爺爺的薪水就是那樣，已經盡力了。台北的生活就是那樣，一碗麵三十塊，一間房八百塊房租，算盤撥一撥，日子就是過得去也過不去。可是她心裡有一根刺，在那個傍晚，在二姑媽發燒的那一天，她不想要這樣，她不要自己的孩子在大便裡打滾，不要在女兒燒到四十度的時候自己卻在一間餐廳裡對著客人微笑。

「我那時候就想，我不要這樣了。」阿嬤說。「我不要我的小孩在那種環境長大，我不要她們生病的時候我不能在旁邊。我要有一個自己的家，一個可以好好照顧她們的地方。」這個念頭，像一顆種子，在她二十二歲的心裡，在那間八德路的破屋子裡，在兩個孩子的哭聲中，堅定地發了芽。

她知道，端盤子端不出一個家。

所以她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。她要擺一個麵攤。街邊的那種，幾張桌子幾張椅，一把大傘撐開，下雨的時候雨水從傘緣滴下來，滴在客人的肩膀上，可是那又怎樣呢？至少，兩個孩子可以在她的身邊。她可以一邊下面一邊看著她們，可以在她們哭的時候彎腰抱一抱，可以在她們餓的時候盛一小碗麵吹涼了

[7] 六福客棧開幕，https://www.cna.com.tw/news/ahel/202501075002.aspx，（檢索日期：2026 年 5 月 18 日）。

餵給她們。

麵攤支起來的那天，台北的天空是什麼樣子，沒有人記得了。可是阿嬤記得的，是兩個姑媽坐在攤子旁邊的小板凳上，乖乖地不哭不鬧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看著媽媽的手在熱氣騰騰的湯鍋上翻攪，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了。

麵攤的生意慢慢好了起來。阿嬤煮的麵，湯頭是用骨頭熬的，熬到湯色濃白，熬到整條巷子都聞得到香氣。客人來了，坐下來吃一碗，擦擦嘴，明天又來了。大姑媽長大一點了，會幫忙拿碗筷；二姑媽長大一點了，會幫忙擦桌子。兩個小女孩在麵攤的油煙和笑聲裡長大，皮膚被爐火烤得紅紅的，手腳俐落得不像那個年紀的孩子。阿嬤看著這一切，她心想不只要一個家，她還要一個更大的家。她要讓這兩個女兒住在好一點的地方，要讓她們不用在街邊的寒風裡寫作業，要讓她們知道，有一個比男人更硬氣的媽媽。所以當麵攤的生意穩定下來之後，她走進了銀行。

那是民國六十七年，她二十八歲。

她跟銀行說，她要借錢，她要開一家熱炒餐廳。銀行的人看著她——一個女人，一個客家女人，一個沒有讀過什麼書的女人，一個手上還有麵粉和油煙味的女人。或許他們會覺得好笑，可能會覺得這是哪來的勇氣，可能會在心裡撥算盤，計算這個女人的還款能力。可是阿嬤沒有退縮。她拿出麵攤的帳本，一筆一筆，清清楚楚。她說得出每一種菜的成本，說得出每天的客流量，說得出自己幾點起床、幾點收攤、幾點去批菜市場的貨。

「我的數字不是學校學的，是每天在那邊算算算，算出來的。」

銀行核准了。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向金融機構借錢，卻不是最後一次。阿嬤後來常說：「銀行的錢不是錢，是機會。機會來了，你敢不敢拿？敢拿，就是你的。」

熱炒餐廳開起來的那一天，她站在門口，看著那塊嶄新的招牌，忽然覺得這條路好長。從西湖的田埂，到八德路的破屋子，到街邊的麵攤，到這間餐廳——她走了十五年。她轉過頭，看見兩個姑媽在餐廳裡幫忙擺碗筷，動作已經很熟練了。大姑媽的身高剛好搆得到桌子，二姑媽踮著腳尖才能把碗放到櫃子上。她們的臉上紅撲撲的，不是小時候發燒那種不正常的紅，而是健康的、充滿希望的紅色。

「那時候我真的滿開心的，」阿嬤說，「就覺得，終於有一點像樣了。」

阿嬤笑了。

我想那是她來台北之後，第一次真正地、從心底裡，笑了出來。

那些沒說出口的事

餐廳開了一年，賺的錢比阿嬤在西湖種一輩子的地還要多。她把麵攤收了，沒有留戀。那輛推了許多年的攤車，靜靜地立在巷口的角落，像一匹老了被人卸了鞍的馬。阿嬤沒有賣掉它，也沒有送人，就讓它在那裡生鏽、積灰。

我問她為什麼不丟掉，她說：「也不知道，就是捨不得啦。那是苦過來的東西。」

錢進來了，像一條終於疏通了的河。

她先是在合江街開了兩間小旅店。不大，但乾淨。她把客家人的那種對「乾淨」的執著帶進了每一個房間——床單要洗到發硬，地板要擦到反光，廁所裡不能有一絲異味。客人來了，睡一晚，走了，下一批客人又來。旅店的生意說不上大紅大紫，但穩穩當當，像一條細水長流的小溪，不驚人，但從不斷流。

然後，她買了房子。

大安路一段，那是台北市的精華地段，到今天都是。她三十一歲，一個從苗栗西湖來的客家女兒，一個只讀過三年小學的女人，在台北市的大安區，有了自己的房子。

「鑰匙拿在手上的時候，覺得很重。」阿嬤說。她站在空房子裡面，牆壁還是新的，地板還沒鋪，陽光從窗戶照進來，整個房間亮亮的。「我那個時候就想到八德路那個租的房子，那麼小，小孩大便弄得滿地。想說，終於啊，終於有自己的房子了。」

她沒有哭。可是她的眼眶紅了很久。

同一年，她生下了三姑媽和我爸爸。一對姊弟加上原來的兩個姑媽，家裡變成了四個孩子。四個孩子四張嘴，四個人的學費、衣裳、醫藥費，像四條繩子，把她拉得更緊了。可是她不怕。「從十三歲就在吃苦了，哪有什麼好怕的？」她只是繼續走，繼續扛，像西湖田裡那頭水牛，一生都沒有停下來的命。

餐廳的生意實在太好了，好到苗栗的姊妹三人也來了。她們是她在西湖的親姊妹，是同一個灶下長大的，是同一對重男輕女的父母養出來的。她們看著阿嬤在台北站起來了，也想要站。阿嬤沒有多想，讓她們進來，讓她們在餐廳裡幫忙。她想，這是自己的親姊妹，骨頭裡流著一樣的血，不會有問題的。

可是帳不對了。

會計的數字，像一件織壞了的毛衣，這裡多一針，那裡少一針，怎麼看都不對。阿嬤讓人在廚房裡裝了監視器——不是為了抓誰，只是想知道到底怎麼回事。畫面調出來的那天，她一個人盯著螢幕，很安靜地看了很久。螢幕裡，她的三個親妹妹，在收銀台前，在沒有人注意的時候，把錢放進自己的口袋。一次，兩次，三次。不是一兩百塊，是四千、五千的拿。那些錢，是她從二十八歲開始，一天一天、一碗麵一碗麵、一盤菜一盤菜攢下來的。是她在產檯上生下四個孩子之後，還沒坐完月子就回去顧店賺來的。

她沒有叫她們來對質。沒有撕破臉。沒有報警。甚至沒有在她們面前，露出任何一絲不一樣的表情。她只是安安靜靜地把監視器的畫面關掉，站起來，去廚房炒菜。她回憶起那天晚上，客人很多，爐火很旺，鍋鏟翻飛的聲音蓋住了一切。她站在油煙裡，汗從額頭滴下來，滴進鍋裡，茲的一聲，什麼也沒留下。

她始終沒有在她們面前道破這件事。

為什麼？我後來也想了一下，是因為怕撕破姊妹情分嗎？是因為那個年代的女人，被教導要忍耐、要顧全大局嗎？還是因為，在她們還是小女孩的時候，在那個重男輕女的西湖老家裡，她們和她一樣，沒有吃過一頓飽飯，沒有穿過一件新衣，沒有被任何人珍重地對待過，所以她們看到錢，就像餓了很久的人看到食物，忍不住伸手了？

我不知道，阿嬤只說：「算了。」這根本說不上是回答，但看著阿嬤的眼神，感覺也沒必要問下去了。

一九八四年，麥當勞來了。

金色的拱門在台北的街頭亮起來的時候，年輕人像潮水一樣湧了進去。漢堡、薯條、可樂，美國來的食物，又新潮又時髦。肯德基也來了，炸雞的香味飄滿了西門町。台灣人的舌頭，正在被一場巨大的飲食革命翻攪著。熱炒的鍋氣、豬油的香氣、醬油和九層塔的味道，忽然之間，好像變成了老舊的東西，像阿嬤衣櫃裡那件補了又補的舊衫，還可以穿，但穿出去，已經不好看了。[8]

餐廳的生意，像退潮的海水，一天一天地落下去。

隔年，阿嬤把餐廳收了。

[8] 台灣速食發展的近況，https://www.miobuffer.com.tw/clwm/199510/03.htm，（檢索日期：2026 年 5 月 18 日）。

「也沒什麼好留戀的啦，」她說：「時機過了就是過了。」餐廳關門那天，她把員工的薪水結清，桌子擦一擦，爐子關了，燈關了，鐵門拉下來，就走了。

阿嬤三十六歲的時候，開了一家咖啡館。

咖啡館在農安街，小小的，不算大，但佈置得溫馨。她學會了煮咖啡，學會了做簡餐，學會了在午後的陽光裡，替客人端上一杯拿鐵，上面拉一朵小小的花。她把兩間小旅店收了，開始把錢投入到房地產——永和、新莊、內湖、景美，一間一間地買，店面、房子，像在下一盤很大的棋。她不懂股票，不懂基金，她總是說：「房子是實的，地是實的，摸得到，踩得穩，不會像餐廳那樣，說倒就倒。」

可是她真的好忙。

忙到什麼程度呢？四個孩子，四個不同的年紀，四個不同的學校，她要管他們的功課、他們的便當、他們的制服有沒有燙平、他們的感冒有沒有按時吃藥。同時，她要看咖啡館的帳，要去收房租，要處理房客的水龍頭壞了、馬桶堵了、隔壁鄰居太吵了。她像一隻陀螺，被生活的鞭子不停地抽著，轉啊轉啊，轉到連停下來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。

也轉到，連牙齒都沒了。

我小的時候，一直覺得阿嬤的牙齒很奇怪。白白的，整整齊齊的，看起來很漂亮，可是笑的時候，會整排一起動，像一個獨立的零件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那是假牙。所有的牙齒，都是假的。

我問她，妳的牙齒怎麼了？

她正在廚房裡切菜，頭也沒抬，語氣很平常地說：「年輕的時候沒在看牙齒的啦。捨不得花那個錢，植牙一顆多少你知道嗎？而且哪有時間？餐廳那麼忙，孩子那麼多，等到發現牙齒壞掉了，一次壞好幾顆，看醫生要看好幾次，太麻煩了。後來想想，乾脆全部拔掉，做一整副，一次解決。」

她說得那麼輕描淡寫，像是在說今天菜市場的高麗菜一斤多少錢。我不敢想像那個過程。把一口健康的、甚至只是有點蛀的牙齒，全部拔掉。一顆一顆地拔，把自己的牙齒交出去，交給了四個孩子的未來，交給了她從二十二歲就開始追的那個夢——一個自己的家。

傳統的活體假牙，戴上去有多不舒服，我是聽人說過的。磨牙齦，壓口腔，吃東西的時候會晃，說話的時候會擔心掉下來。剛戴的那幾年，她一定吃了很多苦。她把假牙拿下來清洗的時候，癟著嘴的樣子，看起來好老，好瘦，

所以每次看到她拿下假牙，我都會轉過頭去，不敢看太久。

不是因為不好看。

是因為，那會讓我覺得難過。

自己

四十歲那年，阿嬤終於停下了奔波的腳步。不是停下工作，而是停下那種被生活追著跑的倉皇。

兩個姑媽已經成年了，可以幫她看顧三姑媽和爸爸。阿嬤終於可以不用一邊炒菜一邊回頭看孩子有沒有跌倒，不用在收攤的深夜把孩子從椅子上搖醒揹回家。她可以把全部的力氣，都放進農安街那家咖啡館裡。

她把簡餐的選項加上去了。

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菜單，就是排骨飯、雞腿飯、牛肉燴飯，那種你在台灣任何一條巷子裡都找得到的、尋常到不行的飯。可是阿嬤不一樣，她在做這件事的時候，已經開始注意那些外國來的快餐店——麥當勞、肯德基，她曾經的對手，現在變成了她的老師。她站在那些店裡，看人家怎麼排隊，怎麼點餐，怎麼在三分鐘內把食物送到客人手上。她看不懂那些連鎖店的標準作業手冊，可是她的眼睛就是她的筆，她的記憶就是她的檔案櫃。看一次，記住了，回去就試。她要快，還要好吃。客人沒有耐心等，可是客人也不會因為快就原諒難吃。這是她從麵攤時代就懂得的道理。

結果她把咖啡館開成了便當店。

說「不小心」是真的，她沒有規劃過這件事，沒有做市場調查，沒有品牌願景。她只是每天站在油鍋前，把一片一片的排骨裹上粉，丟進油鍋裡，炸到金黃酥脆，撈起來，瀝油，切塊，鋪在飯上，淋一點滷汁，旁邊擺上滷蛋和酸菜。客人來了，坐下來，吃一口，眼睛就亮了。明天又來了。後天又來了。帶朋友來了。帶同事來了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最後變成一天賣一百五十個炸排骨便當。

一百五十個。

「現在想起來都不知道那時候怎麼做的。」阿嬤說

阿嬤和兩位副廚，從中午忙到晚上。炸排骨的油煙味沾在頭髮上、衣服上、皮膚上，洗都洗不掉。她的手指因為長期拿鍋鏟而變形，關節粗大，像是老樹的枝幹。她的膝蓋因為站太久而開始痛，有時候蹲下去就站不起來，要扶著牆慢慢撐。

「痛就貼藥布啊，不然怎麼辦？還是要站啊。」她說得很理所當然。

可是人會老，身體會說話。到她終於願意聽的時候，聲音已經很大了。

五十一歲那年，她把品牌收起來了。

她把店面租出去了。她終於可以不用清晨五點起床，不用在油鍋前站十個小時，不用在深夜結帳的時候發現今天的排骨進貨又漲了兩塊。她可以睡晚一點，可以慢慢地吃一頓飯。

然後，爺爺走了。

是大腸癌。發現的時候已經不算早了，治療了一段時間，還是沒能留下。他一輩子穿制服，一輩子站得筆挺，連生病的時候都不太吭聲。他走的那一天，阿嬤坐在病床邊，握著他的手。那雙手，曾經握過槍，在總統府裡握過公文，在八德路的租屋裡握過女兒發燙的額頭。那雙手，後來變得很瘦，骨頭一根一根的。

爸爸說爺爺走了以後，阿嬤一個人坐在客廳裡，坐了很久。

「我那時候就在想啊，」阿嬤說，「我這一輩子都在忙，賺錢、養小孩、還貸款、炸排骨，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什麼。他走了以後我才覺得，人生真的很無常，說沒有就沒有了。所以我啊，剩下的時間要為自己活了。」

爺爺的離開，像一記悶雷，把她震醒了。

她說，世事無常。這句話，她年輕的時候就聽過。可是聽過和懂過，中間隔著一輩子的距離。她活了五十一年，經歷過家族的大起大落、親人的背叛、丈夫的離世、身體的衰敗——她才真正地、從骨子裡地，懂了這四個字。所以她決定，要認真過自己的生活。

她選了一個日本的佛教。她開始跟著教團去登山，去日本靜修，去參訪那些古老的寺廟。「剛開始也不會日語啊，就一直聽、一直記，用注音符號寫在筆記本上。」她說。「我那時候就想，人家都可以，我為什麼不行？」照片裡她穿著白衣白褲，赤腳走過迴廊，低頭合掌，在佛前誦經。她用客語的舌根，一個音一個音地學日語的發音，學得很慢，可是學得認真。她會在筆記本上用歪歪斜斜的注音符號標註日文發音，像一個小學生一樣，一遍一遍地唸。

她學會了日語口說。

後來她在教團裡做到了主任。主任，不是什麼了不得的頭銜，可是對她來說，那是她這一輩子，第一次因為「自己」而被看見。

阿嬤說：「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啦。」但笑了一下。「但那是第一次覺得，人家不是因為我會賺錢還是會養小孩才找我，是因為我這個人才找我的。」是

因為她願意學習，願意服務。她做這些事的時候，沒有人付她薪水，沒有人給她分紅，她甚至要自己貼錢。可是她做得很快樂。阿嬤說那種快樂，跟年輕時候賺到第一桶金的快樂不一樣。那時候的快樂是帶著緊繃的。現在的快樂是輕鬆的，像午後曬過的棉被，蓬蓬的，有太陽的味道。

她現在沒有接主任的工作了。年紀大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爬山了。可是我還是會跟著她，一起去參加祈念的活動。每個月總有那麼幾天，我們會在佛堂附近會面。她總是提早準備好，穿得很整齊，左手掛著唸珠，手裡提著一個小小的布包。看到我來了，第一句話永遠是：「吃飽了沒？你怎麼還這麼瘦？」

我說吃了。她不信，再看我一眼，從布包裡翻出一個袋子，有時候是包子，有時候是一小盒切好的水果。她說：「等一下要誦經，會餓啦，你帶著。」我接過來，其實不餓，但還是會吃。因為我知道，那個袋子裡的東西，是她出門前特地繞去巷口買的。

然後她開始跟我說今天活動的內容。「今天那個陳講頭要分享啦，上次那一段經文要複習，還有李信者最近身體不好，要幫他迴向。」。她說這些的時候，語氣很輕，像是在講一件很自然的事，就像她年輕時候說「今天要炸一百五十個排骨便當」一樣，沒什麼了不起，只是該做的事。

我們一起走進佛堂。她走得不快，但很穩。我走在她後面，看著她的背影。唸珠在她左手上輕輕晃動，發出細細碎碎的聲響，像她這一生的腳步聲——不大，卻從沒停過。

坐下來之後，她閉上眼睛，開始誦經。日語的經文，從她嘴裡唸出來，帶著濃濃的客家腔。那個腔調很奇妙，像是兩種故鄉在她身上同時活著，一個是西湖的山谷，一個是日本的古寺。它們本來毫不相干，卻在她七十幾年的人生裡，莫名其妙地相遇了，然後安安靜靜地住在一起。

誦經結束後，大家會聚在一起喝茶、聊天。她坐在那群人中間，說日語，偶爾夾幾句客家話，笑起來的時候，假牙亮亮的。那些比她年輕的師兄師姐都叫她「主任」，雖然她已經不是主任了。她會揮揮手說：「不要叫了啦，退休了。」可是我看得出來，她其實是高興的。

結束後，我們一起走出去。天色常常已經暗了，路燈亮起來，把她的影子拉得長長的。「下次什麼時候？」我問她。她想了想，翻開隨身的小本子。那本子真的很小，封面都磨破了，裡面用歪歪斜斜的字跡記滿了日期和名字。她說了一個日期，我記在手機裡。

「你要來喔。」她說。不是命令，也不是請求。就是一種很平常的、像是確定我會在的那種語氣。

「好。」我說。

她點點頭，轉身走向公車站。我站在原地，看著她走。她的背有一點駝了，腳步有一點拖，可是她走得很篤定，像是她知道路在哪裡，也知道路的盡頭有什麼。

其實我不知道她這一輩子，到底有沒有找到她想要的東西。

那個在八德路的破屋子裡對自己說「一定要有自己的家」的年輕女人，如果看到現在的自己——有自己的房子，有夠用的租金收入，有四個長大的孩子，有唸珠、佛堂，有一個會陪她去祈念的孫子——她會覺得，這就是她要的「家」嗎？

我不知道。

可是每次看到她從布包裡拿出水果、問我「吃飽了沒」的時候，我總覺得，那一瞬間，她身上沒有任何人的影子。不是誰的女兒，不是誰的太太，不是誰的媽媽，不是誰的老闆。她問我吃飽了沒，不是因為她覺得自己「應該」要問。只是因為她想問。

她就是她自己。

這樣就很好了。